

社會主義經濟的毛病在哪裏？

● 李維森

一 社會主義思想的起源： 從柏拉圖到歐文

一般來說，「社會主義」一詞意謂着兩個獨立但相互關聯的存在。作為一種理論存在，它意指一種旨在改變或維繫人類某種生活狀態和社會秩序的教義或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社會實存，它意指一種社會經濟制度。與此二者相關聯，社會主義有時也指基於某種社會理想並旨在把這種社會理想對象化的社會運動。蘇聯一位學者沙伐萊維奇(I. Shafarevich)曾指出，社會主義的教義要比社會主義的國度晚出現上千年。他還強調指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決非限於我們這一世紀的現象^①。另一位著名的西方學者維特弗格爾(K. Wittfogel)也曾指出，社會主義傾向曾存在於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以及古代中國社會中。維特弗格爾和沙伐萊維奇還認為，在古代南美洲的印加帝國、哥倫布到達之前的美洲、東非，以及太平洋島國的古代社會中，也曾有過社會主義類似的國度^②。沙伐萊維奇還指出，沒有古代千禧年社會主

義(chiliastic socialism)的意識形態，當代社會主義不可能變為社會實存^③。

人為重組社會秩序的最早倡導者之一是柏拉圖。在《共和國》中，柏拉圖表達了他對理想國的憧憬。而在《律法》中，柏拉圖則表達了他對實現其重組社會秩序的現實手段和方法。柏拉圖對他的理想國的描繪，對後來的千禧年社會主義者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的思想的形成，無疑都有一定的影響。

《聖經》中也有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胚芽。《聖經》的一個基本精神是，上帝創造了世界讓世人來享用，人可以通過與自然以及與人的爭戰來佔取和享用自然資源。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聖經》(特別是《舊約》)的基本精神蘊含着對剛性的私有財產的否定。另外，在《新約》中，也記載了早期基督徒團契中的類似共產主義的實踐活動。這一精神和實踐對西歐社會中世紀及其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孕育，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在中世紀和宗教改革運動的初期，西歐社會中的千禧年社會主義，都是以宗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存在，它意指一種旨在改變或維繫人類某種生活狀態和社會秩序的教義或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社會實存，它意指一種社會經濟制度。

教的形式出現。一些千禧年社會主義的教義在中世紀也引發了一些異教徒的世俗運動。到十七、十八世紀，基督教社會主義在奧地利、比利時、德國、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均有一定的傳播。

十六、十七世紀是社會主義思想史的一個重要時期。在這時期，出現了許多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思想家。1516年，莫爾寫出了他的名著《烏托邦》。在這一著作中，莫爾一方面致力於批判現實世界的條件，一方面臆想了一個類似社會主義的國度。大約一個世紀後，康伯內拉(T. Campanella)在他的《太陽城》中，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國度的憧憬。幾乎在同一個時期，海靈頓(J. Harrington)在他的著作《歐申娜》(Occeana)表露了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溫斯坦利(G. Winstanley)不但在《自由法典》一書中表達了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一些基本原理，而且在英國革命時期出現的掘地運動(movement of the Diggers)中，試圖把他的這些基本原理付諸實施。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理論家就今天的標準來說是天真的。然而，他們提出的許多主張和原則，卻被後來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承襲下來。

在十七、十八世紀，社會主義在西歐各國得到廣泛地傳播。在這一時期不可勝數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中，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們思想和學說對馬克思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設想，以及對後來的思想家們對當代社會經濟制度的設計，均有一定的影響。法國學者杜克海姆曾注意到，這三大社會主義者的最明顯的特徵是他們並不像十六、十七世紀的空想社

會主義者那樣追求藝術上的滿足和成功，亦不追求靈魂上的安慰。恰恰相反，他們的目的完全是實踐導向的④。泰夫(P. Taft)也評論到，與十八世紀前的社會主義者那樣回盼過去的黃金時代不同，十八世紀後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旨在探索幸福的未來⑤。

二 規劃與證偽：從馬克思到當代改革理論家

人類對社會主義理想國度的追求，在十九世紀中葉達到了一個巔峰。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中一直佔支配地位。當代七十餘年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實驗歷史，可以說是馬克思思想的一條注腳。然而，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景象究竟是怎樣的？這一問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中間，以及在馬克思主義學派內部，均是有爭議的。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對未來社會並沒有提供一個系統的框架(參見諾夫⑥、歐爾門⑦、摩爾⑧)。然而，筆者認為從1844到1848年期間，馬克思作為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者(不到30歲)，他確實為後資本主義社會構劃了一個較為清晰的框架，儘管他在這一時期對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描述是離散地分佈在他的許多著作中，這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4)，《神聖家族》(1845)，《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46)，《哲學的貧困》(1847)，和《共產黨宣言》(1848)。

1843年，年輕的馬克思從德國遷居到巴黎，致力於研究社會主義和歷史著作。受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的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中一直佔支配地位。當代七十餘年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實驗歷史，可以說是馬克思思想的一條注腳。



1959年，赫魯曉夫與尼克松在莫斯科的一個美國展覽上，借廚房為題激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優劣，三十年後，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得「走資」了。

思想的影響，加上與恩格斯、魏特林和蒲魯東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結識，使馬克思形成了他早期的共產主義思想。綜合馬克思（一些與恩格斯一起）的上述著作中對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論述，我們可以概括出他的未來社會構想的基本框架：（1）在未來社會中私有制已被消滅，從而不存在所有制問題；（2）勞動分工已不存在；（3）人類活動中的相互關心和合作已達到了很高的程度；（4）只有一種社會制度存在於人世間，國家、種族、宗教、階級、職業和地域（包括城鄉）的差別已完全消失；（5）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們已徹底消滅了異化和疏離（estrangement）；（6）人們已完全控制了自然，從而「共產主義是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衝突的真正解決」^⑨。馬克思不但對後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這樣一個基本輪廓，而且與恩格斯一起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實踐的基本手段與方法。這包括，廢除私有制，徵收高額收入累進稅，廢除財產繼承權，集中信用、通訊與交通手段於國家手中，實行義務教育，等等。

從上述馬克思對後資本主義社會

的構想以及對實現這一構想的手段提出中，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40年代，馬克思確實對未來的後資本主義社會提出了一個較為清晰的理論框架。然而，自從十九世紀50年代馬克思的研究興趣從哲學、政治學轉向經濟學之後，他在早期著作中所勾畫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影像在他的後期著作中變得模糊不清了。並且，愈到後期，馬克思對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討論越少，相應地他思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影響變得越模糊不清，以致於在1850年後數十卷馬克思的著作中，我們僅能從屈指可數的段落中找到馬克思對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描述（但恩格斯本人的十九世紀50年代後的著作中仍有很多有關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描述）。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把這一現象的原因歸諸於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作的解釋。馬克思說，他不打算預測未來社會是怎樣的，他認為那是空想社會主義所做的事。馬克思提出，他自己的任務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⑩。事實上，馬克思（早期）對未來社會的構想超出了人類社會的技術可能性，這

一點在他的時代已比較明朗了。他本人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①。因此，後期的馬克思（請注意，我們這裏指十九世紀50年代後——這一劃分不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對早期與晚期馬克思的分期法）顯然是從他年輕時期（24–30歲）所規劃的未來社會的立場後退了。筆者認為，從《共產黨宣言》之後，或更精確地說，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58）開始，馬克思早期所形成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影象，實際上已變成了他內心理論世界中的一個他既有所懷疑但又不想放棄的思想沉澱。

作為一個成熟和深邃的思想家，馬克思在他的晚年把後資本主義社會劃分為兩個階段。對於這一社會的初級階段，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或合作社會。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也稱它為「自由人聯合體」^②。應該說，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未來社會的規劃的基本原理，與他在《資本論》第一章中對「自由人聯合體」描述的精神是一致的。這是成熟的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最後憧憬。儘管他在《哥達綱領批判》與《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對後資本主義社會只是規劃了一個非常模糊的框架，但這一框架卻為當代社會主義經濟的運作鋪設了理論基石。沙夫爾（H. Schäffle）曾對馬克思晚年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劃作過如下歸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按勞動貢獻分配消費品，用勞動時間作為計量成本、計劃總生產規模和分配消費品的唯一尺度^③。雖然馬克思本人對這一歸納持否定態度，並明確地表示這是沙夫爾把自己的發明強加於他身上^④。但現在看來，沙夫爾確實抓住了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中對未來

社會規劃的基本精神。

馬克思理論中所蘊含的強烈的實踐導向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激起了一個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沙皇俄國的衰朽，給俄國布爾什維克提供了一個奪取國家政權的機會。然而，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時，他們並沒有一個管理實際國民經濟的周詳計劃。開始時布爾什維克只是簡單地遵循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幾大措施，迅速將銀行、工廠和土地國有化。在1917年，列寧以早期的馬克思的同樣口吻描述未來社會的形象：「整個社會將會變成一個辦公室和一個工廠，在其中實行同工同酬」。^⑤

為了盡快把俄國經濟過渡到國有化並實現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後迅速採取了「戰時共產主義」的措施。這裏應特別指出「戰時共產主義」是一個欺罔視聽的概念。因為，「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蘇聯所採取的一些政策措施，決非像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所宣稱的那樣是出於戰爭的需要。事實上，在1920年春天到1920–21年冬季蘇聯採取戰時共產主義的極端措施時，在蘇聯境內和邊境上根本沒有任何大的軍事衝突發生。正如沙伐萊維奇所指出的那樣，「戰時共產主義的實施，決非出於戰爭所必需，而完全出於一種理論上的動機和考慮」^⑥。事實上，戰時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年輕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完全對象化於一個國家的天真嘗試。

蘇維埃政府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所作的較快跨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天真嘗試，給蘇聯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蘇聯工業和農業產量急劇下

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開始，馬克思早期所形成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影象，實際上已變成了他內心理論世界中的一個他既有所懷疑但又不想放棄的思想沉澱。

戰時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年輕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完全對象化於一個國家的天真嘗試。而蘇維埃政府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所作的較快跨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天真嘗試，給蘇聯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馬克思以及他的後繼者們均堅定相信人類合理駕馭和重組社會經濟的能力。然而，從戰時共產主義起，每次實驗似乎都只帶來經濟災難。

降。面對國民經濟的災難性後果，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從戰時共產主義的一些極端措施中後退下來。接着，蘇聯進入了「新經濟政策」時期。即使列寧也公開承認，「新經濟政策」是一種後撤^①。

在較快地跨入一個沒有市場的完全行政控制經濟的努力失敗後，蘇聯領導人不得不探索現實的管理國民經濟的方法。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蘇聯逐漸形成了一個農業集體化、工業國有化、消滅私有經濟並中央集權的社會經濟體制模式。這一體制常被西方學者稱為「斯大林命令經濟的古典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體制模式傳播到東歐、東亞、拉美和其他欠發達國家。這一模式的特徵在1945–53年期間的斯大林時代充分地表露出來。其運作的基本原理反映在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小冊子中。與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布哈林及他人的《共產主義ABC》所共同主張的那種直接計劃和沒有市場機制的模式構想不同，斯大林在這一小冊子中公開發認商品關係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

濟中仍然起作用。斯大林認為，商品、貨幣、工資、價格這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要素之所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在於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之間的交換關係。但斯大林仍然否定國有經濟內部存在着實質性的交換關係。這裏且不管斯大林的觀點正確與否，但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這就是，十月革命後三十餘年的行政控制經濟的實踐，迫使斯大林和社會主義理論家們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後資本主義經濟的構想與規劃上後退了一大步。

在1956年的非斯大林化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們開始表達出改革斯大林命令經濟的古典模式的要求。最早對斯大林模式提出挑戰的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隨後為波蘭1956年的經濟改革。自50年代起，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大約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從1953年至1956年，第二次約從1964年至1970年，第三次約從70年代後半期到現在。1978年以後，中國大陸也開啟了改革的引擎。然而到80年代後半期，在所有推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以改革計劃體制、引進市場機制、擴大企業經

營權為主要特徵的改革，均沒有較大幅度地改進實際經濟的運作，相反卻引發了許多改革家始料不及的社會問題。在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人民大眾以及一些改革理論家們似乎突然醒悟到，對社會主義經濟修補地改革是徒勞無益的。相反，整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應該徹底改變與放棄。在半個世紀之前，在蘇聯和東歐各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最時尚的術語是國有化、社會化、集體化、集權化和非市場化。而到80年代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學界的時髦術語則變成了私有化、非集體化、非國有化、分權化和市場化¹⁸。然而，據筆者的悲觀估計，在獨聯體和東歐各國共產黨政府下台後，儘管新政府公開宣佈不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些國家行政控制經濟的實質還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通觀整個演進過程，可以看出，總是社會主義理論家先設計一個社會經濟體制的理論架構，然後，他們再努力把這種理論架構付諸於社會實存中去。結果，這種理論架構對象化為社會經濟機制中的一種人為機制。而這種人為機制又總是不斷地與社會經濟運行機制中的自然機制發生摩擦和撞擊。結果，理論家們的猜測與預期被實踐所證偽了，他們對社會經濟體制理想模式的規劃也隨之為社會現實所拒絕了。現實迫使他們修改社會經濟體制模式的設計。然而，一旦當他們形成新的經濟體制模式的理論架構，他們就會盡全力再把這些理論架構對象化於社會現實。結果又再一次被社會現實所證偽。如此再三，循環往復。以至到80年代末，幾乎所有理論家們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模式的規劃與設計，均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

所證偽了。結果導致了這一制度在蘇聯東歐國家的急劇崩析。用黑格爾的術語來說，自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走過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圓圈。

從上述歷史回顧中，也可以看出，馬克思以及他的後繼者們均為理想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他們堅定地相信人類合理駕馭和重組社會經濟的能力，因而他們有着強烈的衝動去設計和規劃社會經濟體制的理想模式，然後再盡一切努力把這一理想模式對象化於社會現實中去。這一品格亦被當代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家們承襲下來。

三 理論與現實的不兼容： 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解說，社會主義之所以取代資本主義，在於前者的優越性和內在經濟合理性，而其內在經濟合理性主要源於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是因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可以消弭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其實，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一矛盾已被當代資本主義制度中的股份制和現代公司制度所消弭）。建築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生產的社會化可以預期達到外在經濟的內部化，亦即消除經濟的微觀單位對自己目的合理追求所造成的宏觀經濟上的負效率。社會生產目的從私有經濟的利潤動機轉換為社會成員生活需要的滿足，可以預計消除技術發明和傳播的障礙，從而刺激科技進步。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化生產，可以將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一體化，從而為合理組織整個

社會主義理論家總是先設計一個社會經濟體制的理論架構，然後，他們再努力把這種理論架構付諸於社會實存中去。結果，理論家們的猜測與預期被實踐所證偽了，他們對社會經濟體制理想模式的規劃也隨之為社會現實所拒絕了。

社會經濟活動提供了可能性。結果，市場經濟的自發力量的調節為中央計劃所代替，事後調節變為事前調節。一旦經濟增長和發展為中央計劃機制所調控，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過度生產、高失業、週期波動等弊端均可被消除。另外，在這制度的理想模型中，各人向社會總勞動投入的勞動量的多少將為社會成員的收入的唯一來源。因此，社會收入分配也可達到較為公平。

在這制度建立初期，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如前蘇聯、東歐各國和中國大陸)的高投資率、高增長率的發展計劃與政策，確實帶來了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和較快的工業化。也可能因此，行政控制經濟曾吸引東西方一些睿智的學者，包括羅賓遜夫人(Robinson)、卡萊斯基(M. Kalecki)、多布(M. Dobb)、蘭格(O.R. Lange)這些經濟學家。然而，儘管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模式有其內在邏輯美和理論一致性，它預期的優越性和內在經濟合理性並沒有顯露出來。相反，它的許多運行弊端與功能障礙卻成了這些國家的共同現象和難題。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時期。而在同一時期，社會主義各國卻因繞在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慢性短缺中。這一巨大的反差促使東西方的學者去反思障礙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合理性顯露的內在機制。

從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斯大林命令經濟的古典模式中的高浪費、低效率和其他弊端主要源出於國民經濟管理過度集中。基於這一認識，關於經濟改革的理論探討也都發端於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上。從

5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期，東西方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討論焦點也多集中在計劃與市場、集權與分權、政府直接控制經濟的範圍與程度等問題上。伴隨着這些理論上的討論，蘇聯和東歐各國50年代以來的歷次改革，以及中國大陸1978年以來的改革，也基本上從引進市場機制和實行經濟決策的分權化入手。到80年代末，雖然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改革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但傳統命令經濟的高浪費、低效率、結構失衡等現象仍然存在。這表明，旨在從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上對行政控制經濟「開刀」的改革，在80年代末已證明失敗了。改革的實現迫使經濟學家們探尋行政控制經濟的病態機制的深層原因。到80年代後半期，大多數經濟學家趨向於同意經濟改革的困難和行政控制經濟病態機制的深層原因在於社會主義經濟微觀單元的劣效績和行為的非合理化。

事實上，早在50年代，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已開始洞察到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劣效績問題。波蘭1956年以擴大企業與廠長的經營決策權為主要特徵的經濟改革，可以說

儘管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模式有其內在邏輯美和理論一致性，它預期的優越性和內在經濟合理性並沒有顯露出來。相反，它的許多運行弊端與功能障礙卻成了這些國家的共同現象和難題。

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人民失去的只是鎖鏈，贏得的卻是全世界？



是旨在改進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運作的最初嘗試。在60年代上半期，蘇聯經濟學家利布曼(Y. Liberman)也探討了行政控制經濟古典模式的許多問題，並提出了改進社會主義企業運營的許多刺激手段。採納利布曼和其他經濟學家的主張，1965年蘇聯亦把改進社會主義經濟的微觀效率問題作為改革的首要目標。一般說來，儘管行政控制經濟古典模式的微觀單元的劣效績問題早在50年代已被察覺到，但是，直到80年代後半期，經濟學家們並沒有意識到社會主義微觀經濟的劣效績根源於企業的內在結構。而大多數人則認為劣效績源於國家經濟決策的高度集中和沒有完備的市場環境上。即使在目前，恐怕一些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仍然堅持這一點。

社會主義經濟的毛病出在企業的內在結構上，這一重大理論發現事實上應歸功於中國大陸80年代的一代青年經濟學家。1984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進入一個進退維谷的局面。這就是，只要政府(不管以甚麼形式)一放權給企業，就有一個工資和獎金基金的膨脹，並隨之來一個工資提高拉動的通貨膨脹。結果，儘管中央政府願意放權給地方和企業，企業也渴望獲得經營自主權，但改革後的經濟運行實際卻不斷反過來要求政府加強行政控制手段。這就是8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經濟學界常說的改革中企業行為的非合理化的難事。沿着這一思路，中國經濟學家們發現了社會主義企業內部的「所有者缺位」問題。可能出於同樣的觀察但出於不同的思路，科奈在他的1991年著作《通向自由經濟之路》中，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微觀單元的劣效績問題歸結為國有企業的「財產非個人化」問題^⑨。從整體

上來看，社會主義企業的劣效績問題與整個經濟的所有制設置(settings)相關聯，這一點基本上已成為改革理論家們的共識。然而，問題也許沒有這樣簡單。社會主義經濟微觀單元的內在結構問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與探索，實際上將意味着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模式的本質的整體反思。概言之，儘管目前我們還不能清楚地將行政控制經濟失敗的原因全盤托出，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行政控制經濟的毛病是出在它的微觀基礎的內在結構上。

四 結束語：三個層面的微觀分析

由於當代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存在和一種社會實存無時無地不在變化着，若把這一經濟制度放在一個理論透視的整體框架來分析，似乎是困難的。一個可行的方法是，把整個行政控制經濟的演進過程劃分為幾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上，社會經濟體制可以被看成是一個靜態模式或比較靜態模式。從這一點出發，我們粗略地把俄國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發展和演進，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行政控制經濟的古典模式。一些西方學者亦稱之為斯大林命令經濟的古典模式或中央計劃經濟的古典模式。這一階段的時間跨度，在蘇聯約從1929—33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開始到1964—65年的經濟改革時期；在東歐各國，約從40年代中葉到60年代中期；在中國大陸，約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目前，北朝鮮、古巴還處在這一階段上。

第二個階段，改革中的行政控制

社會主義經濟的毛病出在企業的內在結構上，這一重大理論發現事實上應歸功於中國大陸80年代的一代青年經濟學家。他們發現了社會主義企業內部的「所有者缺位」問題。

經濟。西方有些學者亦稱之為半改革或改革後的中央計劃經濟。這一階段的跨度在蘇聯和東歐各國約從60年代中葉起到80年代末止。中國大陸目前仍處於這一階段。越南則剛剛進入這一階段。

第三個階段，超越共產黨政府的行政控制經濟。目前，獨聯體各國和東歐各國已進入了這個階段。

與這三個階段相聯繫，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微觀分析亦應包括三個層面或卷次：

第一個層面，行政控制經濟的古典模式的微觀分析。

第二個層面，改革中的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分析。

第三個層面，共產黨政府之後的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分析。

很顯然，這一研究規劃需要長時期的努力。然而，欲求對已存在大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經濟這一極其複雜的人為制度的運行肌理有一個理性的領悟，這種長時期的努力也許是必須的。

1993年3月於澳洲雪梨大學

註釋

① ③ ⑬ Igor. Shafarevich: *The Socialist Phenomen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p. 132; p. 257; pp. 238–39.

② K.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④ Emile Durkheim: *Le Socialisme; sa définition, ses débuts, la doctrine Saint-Simonienne* (Paris: Librairie Felix Alcan, 1928), pp. 41–42.

⑤ Philip Taft: *Movements for Economic Reform*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2), p. 37.

⑥ Alec Nove: *The Economic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Revisited*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1).

⑦⑪ Bertell Ollman: “Marx’s Vision of Communism: A Reconstruction”, in *Critique* (1978), No. 8: 4–41.

⑧⑭ Stanley Moore: *Marx on the Choic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⑨ Karl Marx: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 by M. Milligan (Moscow, 1959), p. 84.

⑩⑫ Karl Marx: *Capital* (Moscow 1959), Vol. 1, p. 17; pp. 78–79.

⑬ Herr Schäffle: *Die Quintessenz des Socialismus* (Gotha: F.A. Perthes). Cited from Stanley Moore, 1877.

⑮ V.I.U.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excerpt in A. Nove & D.M. Nuti (ed.) *Socialist Economics* (England: Penguin Book, 1972), p. 27.

⑰ V.I.U. Lenin: *Select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p. 149–63, 286.

⑱ L. Nikiforov & T. Kuznetsova: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Desta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Problem of Economics* (November, 1991).

⑲ KORNAL, János: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1991), pp. 52–57, 111, 172.

李維森 1953年生。1982年獲山東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89年獲澳洲國立大學碩士學位，現為澳洲雪梨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曾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